



宜宾城的 2200 年

中共宜宾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著
宜宾市地方志办公室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第一章

犍为郡棘道城



右图：战国铜爵

左图：汉代犍为郡地图

第一节

古僰国的政治经济中心

一、三江孕育文明

岷江猛浪若奔,金江急湍似箭,两江汇合后始称长江,宜宾因此被人们称作“万里长江第一城”。

数亿年前,今天的宜宾大地曾经被湛蓝的海水所淹没,古生物们在这里生生息息,盛极一时,演奏了生命长河中一曲曲悲壮乐章。

海进海退,沧海桑田,生物进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远古时期宜宾的三江六岸孕育人类文明:从原始人到原始人群,从氏族到部落,从旧石器到新石器,至迟在4万年前,这里已有人类生存。五六千年前,这里的人群过着渔猎和原始农耕生活,宜宾人类文明历史和祖国其他地区一样,进入了氏族部落时期。

1951年8月,在今宜宾城近郊翠屏区吴桥村良姜沟出土了原始人类使用过的三件打制石器和三件磨制石斧。

1981年9月—11月,四川大学考古实习队在宜宾进行考古调查。他们在宜宾城附近的金沙江、岷江下游及其会合后形成的长江上游宜宾段的河漫滩和阶地上,陆续发现远古时代人类的文化遗产。

考古工作者仅在今宜宾市境内的岷江边和金沙江一级支流横江边,就发



上图：叫化岩遗址出土的石斧。长9.4厘米、宽5.7厘米

中图：叫化岩遗址出土的有肩石斧。长21.3厘米、宽16.4厘米

下图：叫化岩出土的陶深腹罐。底径9.3厘米、残高16.8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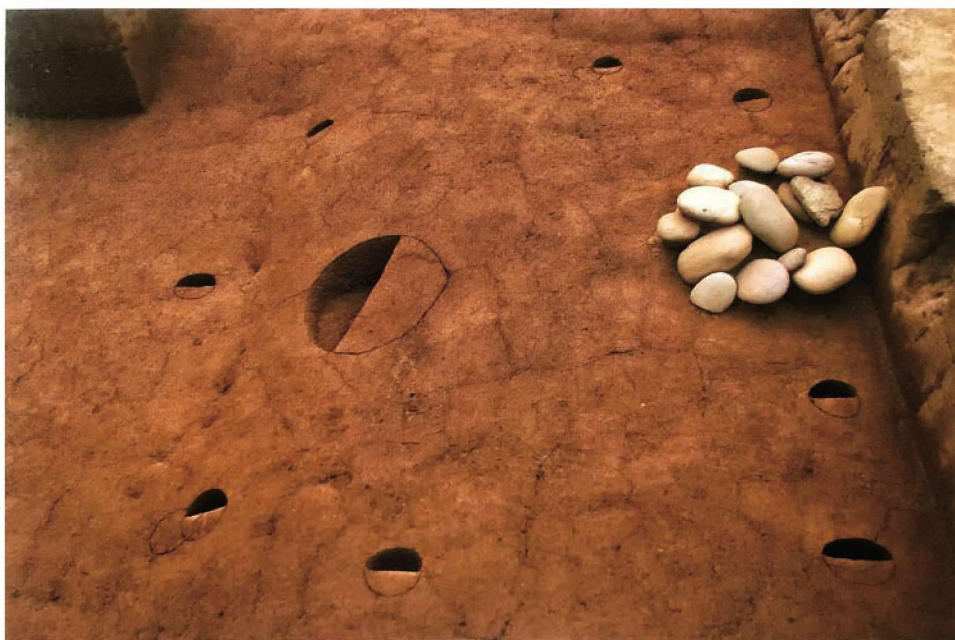


现10处石器采集点,采集到打制石器19件,磨制石器16件,陶片若干块。石器有石斧、石锛、刮削器和网坠等。陶片大多为夹沙黄褐色,其上有蓝纹、方格纹和戳印纹等,在个别的采集点伴随石器和陶片的还有零星的炭屑和骨块残存。

考古工作者在宜宾城区的岷江段河漫滩及阶地上采集到打制石器12件,磨制石器6件,包括石斧、石锛、刮削器、石锄和敲砸器等;在城区金沙江南岸田坝村溪口,发现磨制石斧两件;在城区西郊园艺办事处老桥一组,发现打制石斧一件。

上述石器和陶片,经鉴定,属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遗物。

2009年6月至9月,四川省考古研究院考古队在宜宾市境内首次发掘了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遗址位于金沙江向家坝水电站淹没区屏山县楼东乡叫化岩,距离金沙江边20米。这处新石器时期遗址包括房屋遗址7座、灰坑10个,出土了一大批陶器(片)和石器。出土可辨器型的陶器有花边口绳纹罐、喇叭口高领罐、盘口器等;石器主要有双肩石斧、石斧、石镰、石刀、刮削器等。根据陶器的制作、器型变化、纹饰演变和石器主要为磨制石器判定,遗址的年代在距今4700—5000年,属宜宾市境内首次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聚落遗址。



左上:叫化岩遗址远景。分布面积约4000平方米,发掘面积2000平方米,清理各类遗迹42个。出土新石器时代陶片约5000片,陶质包括夹沙陶和泥质陶

左下:叫化岩遗址房屋基址

三江孕育文明,远古的宜宾先民已经开始了固定的群居生活,他们已组成比较固定的族群,进入了人类社会的氏族部落时期,今宜宾城三江口,是其聚落的中心,后来发展为古夔国的城邑之地。

二、“夔僮之富”

“夔”字最早见于西周时铸于青铜器上的金文。

“夔”,作为一种人群或一个民族的名称,则最早见于秦人的史书《秦纪》和秦国丞相吕不韦及其门人的著作《吕氏春秋》。

在春秋战国时期,秦人用篆文将夔字书刻于竹简之上,成为一种人群(夔人)和一个民族(夔族)的名称。以后“夔”字,又作为一个民族的名称以隶书记入西汉史家扬雄、司马相如、司马迁、班固等人的著作之中。到了东汉,许慎在其名著《说文解字》中,解“夔”为:“夔犍为蛮夷。从人棘声,蒲北切。”至此,夔的音、形、义基本定型,专用于夔人的族名,并沿用至今。

而夔人作为一个民族,则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聚居在以今宜宾市为中心地的川南

右图:卣(yǒu),是中国古代一种盛酒器,盛行使用时期为商代和西周时期。卣在盛酒器中是重要的一类,考古发现的数量很多。其口一般呈椭圆形,有盖和提梁,腹深,有的有脚,形状有圆形、椭圆形、方形、圆筒形等,通体铸有纹饰图案,有的铸有铭文



及滇东北地区了。许慎说的“犍为”，是指西汉的犍为郡。其时犍为郡治所设于犍道城，辖12县。其范围东接巴郡，西至越嵩郡，北邻蜀郡，南连益州郡，即有今之川南、滇东北和黔西北地区。据《中国历史地图集》所载《益州刺史部南部图》测算，其时犍为郡辖境东西横距约378公里，南北纵距约504公里，地跨今川、滇、黔三省。

《秦纪》中有“犍童之富”的记载，这首先是指犍地物产丰富，种植业和渔业发达。

樊人本为农业民族，以农耕种植为主的农业经济早在西周时期就有较高水平，其“耕田，有邑聚”。《太平御览》引《郡国志》说：“西夷（樊）有荔枝园。犍童，诸夷之中最贤者。古所谓犍童之富，多以荔枝为业，园植万株，树收一百五十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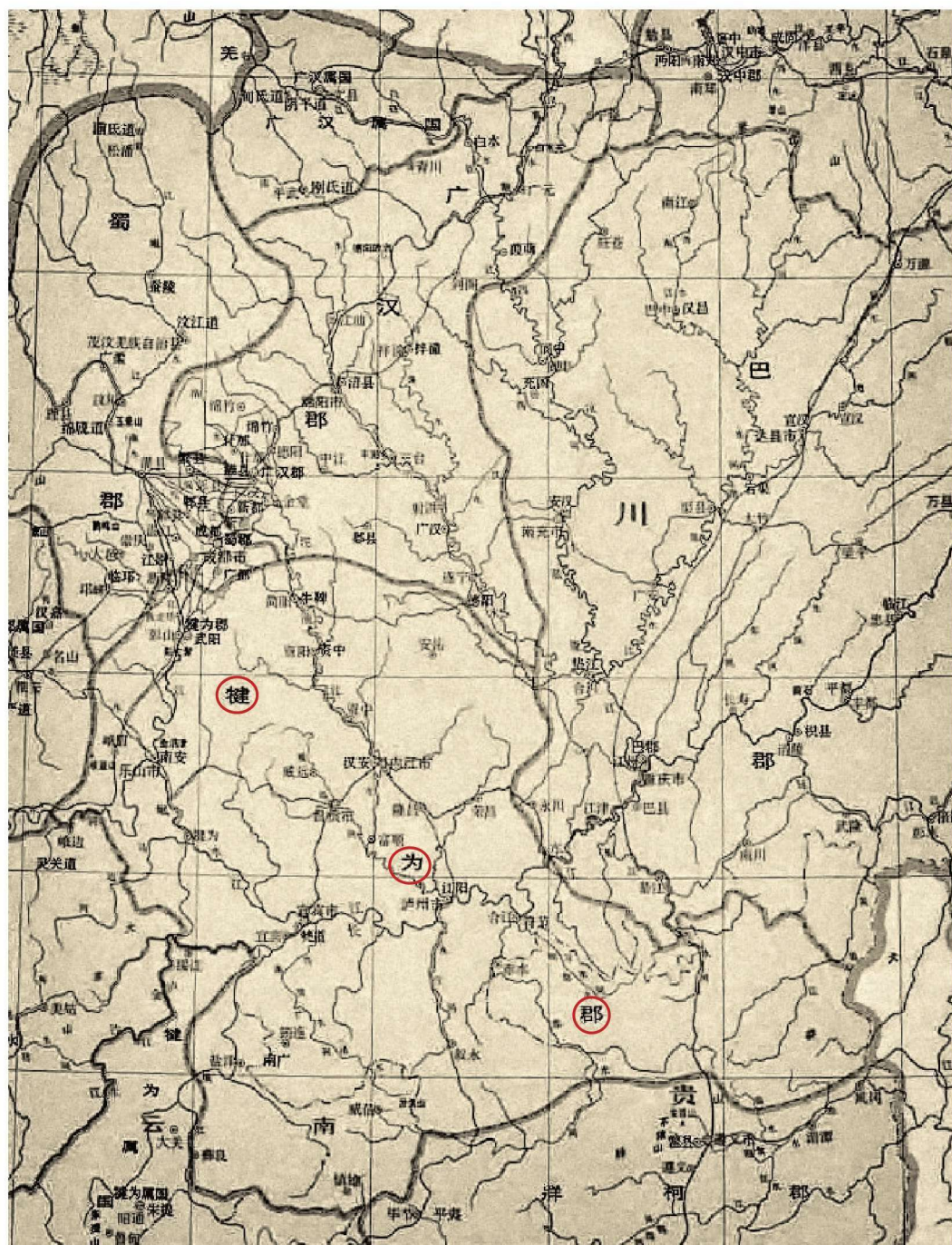
古樊国江河纵横，水域宽广，樊人的渔猎经济也相当发达。《华阳国志·蜀志》：“（犍道）滨江有蜀王兵栏，李冰所烧之崖，有五色，赤白映水。玄黄鱼从楚来，至此而止，畏崖映水也。”《南中八郡志》也记：“犍道江水黄鱼，鱼形头似鳢，骨如葱，可食”。此二书所说的“玄黄鱼”“黄鱼”，就是今天十分珍稀的中华鲟鱼。

其次，“犍童之富”反映了战国秦汉社会“蓄奴童”成风的情况。

那时，王侯权贵、富商大贾一方面以奴童（婢）为财富，另一方面又以奴童为力役，榨取其劳动，积聚财富。权贵富豪家中蓄养奴童“动以万数”。赵国人，后来为秦国相的吕不韦家有奴童万人；蜀地富商卓氏、程郑各有童仆千人。战国社会蓄奴童成风，市场上买卖奴童也成风。东汉人王褒在《僮约》一书中记载，一奴童价值“万五千金”。《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樊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旧京师有樊婢”。巴蜀的豪民富贾把樊童取作“商品”，在市场上买卖，是致巴、蜀二国富强、百姓殷实的一个重要原因。

樊人是“夷中最仁者”，颇有顺理之性，是劳动力市场抢手的人力资源。数量众多的“樊童”，为战国秦汉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为当时巴蜀和樊侯国地方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东汉犍为郡



三、三江口——樊人的“邑聚”之地

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在今川、渝地区除建有巴、蜀两个大国外,还有一百多个较小的,比巴、蜀落后的小国。史家把他们称为“侯王之国”或“古国”。其时由樊人在其聚居的中心地即约今宜宾市境地建立的“樊国”,就是其中之一。

此时的樊国,就其社会性质讲,只是一个高于部落集团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与近现代国家有重大差别,与巴、蜀二国比较也是有很大差距的。当今有学者把这类“国家”称为“古国”,就是要把它们和近现代国家区别开来。

古樊国的辖地甚广,按史籍记载为汉代的樊道县地。汉代的樊道县,治所樊道城在“马湖江会”(今宜宾老城区三江口)。其辖地,东与江阳县(今泸州)接,即有今宜宾市翠屏区、南溪县地和富顺县部分地域;南与朱提(今昭通市)、南广(今盐津)二县接壤,即有今屏山、水富、高县、筠连等地域;西北和北面与南安县(今乐山市)相连,即有今宜宾县、沐川县、犍为县、马边县地及荣县部分地域。这些地方主要就是今天宜宾市的辖境。

古樊国曾经是蜀国的附庸。《华阳国志·蜀志》记:“(樊道),滨江有故蜀王兵栏。”这里的江,是指岷江,“兵栏”,即驻兵的寨栅,是蜀国的国王开明三世(保子帝)出兵沿岷江南下,攻打樊国时修筑的屯兵寨所。蜀王开明三世南征的结果是“雄长僚、樊”。这里的“僚”,指后来的夜郎国,即今贵州地区;“樊”,指樊国,即今宜宾市及云南昭通地区。“雄长僚樊”就是成为“僚、樊”之长,即用兵打败樊国,樊国从此成为蜀国的附庸,蜀国的军事控制范围达及今之黔西北和滇东北地区。

古樊国从春秋初期建立,中途被蜀国征服为附庸,到被秦国占领置为樊道,成为秦国蜀郡的一部分,大约存在了六个世纪。今宜宾老城区西南一隅栈房街、走马街一带,曾经是古樊国的“都邑”。

第二节

秦李冰治夔与汉筑夔道城

一、李冰治夔

公元前316年,秦国占了蜀国。据《华阳国志》等史籍的记载,到秦昭王二十二年(前285年),即秦占领蜀国30年后,秦国蜀郡守张若取今大渡河及金沙江中下游地时,古夔国已成为秦国蜀郡的一部分。

秦占领蜀国后,因春秋战国时期先后臣服于蜀国的夔国等附庸国势力还很强大,所以分封“侯国”与设“郡县”并举。所谓“分封侯国”,就是把原蜀王之国降封为蜀侯之国,但仍维系原国家组织,通过新封的蜀侯进行统治。这一政策措施的实质,是秦通过分封民族首领来治理原民族地方,成为秦国统治蜀地的一项新制度——民族分封制。

这项制度,贯穿施行于秦国统治巴蜀之地的95年中,而施行于夔国,是秦国第三任蜀郡守李冰治蜀的后期。

李冰是战国时代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在公元前277年至公元前238年间担任蜀郡守。李冰治夔,做了三件大事:

第一是扫除蜀、夔的武装力量,把秦国在蜀国创行的民族分封制施行于夔国。秦军在扫除蜀王族和夔王的武装势力后,李冰把夔王降封为夔侯,把夔国降为夔侯国,这就是古籍所称的“夔侯”和“夔侯国”的来历。

此犍侯国,就其辖地而言,是为秦国蜀郡的一部分;就管理而言,仍维系犍国原来的政治实体,由新封的犍侯管理。这就是民族分封制下的“侯国”与“郡县制”并存,也是此期间犍国与秦国实质性的政治关系。

第二是设置犍道。秦灭蜀后,除在蜀国地方推行郡县制和民族分封制外,还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试行与县同级但又有重大差别的“道制”,建立县级政区“道”。这种“道制”,从秦在蜀地试行并成为一种县级政区建置制度到三国时期终止,虽然只有400多年的历史,但以后唐宋时期的羁縻制度、元明时期的土司制度,却莫不发端于此。

秦国入主蜀地后,先在今雅安市设置严道,继而李冰修筑都江堰期间在今都江堰市、汶川、松潘等县地设置湔氐道,随后李冰沿岷江浚河凿岩,把道路通到犍国腹心地方即今宜宾城三江口。这里既是蜀南要冲,犍侯国的中心,又是秦国蜀郡通犍国水陆道路的终点,于是在这里屯兵、置吏,设立了县级政区——犍道。

犍道的设立,是李冰治犍的重大政治成果,这使原来的犍国地方成为秦国蜀郡的一个县级政区,从此秦国在犍国地方实行“侯国”与“道制”并行的统治。

第三是浚河治道。李冰除在岷江上、中游的灌口(今都江堰)和南安(今乐山)治水外,还沿江而下浚河凿岩,打通成都至宜宾的水路通道。在这中间最著名的是在今宜宾城西岷江畔凿岩创造的“积薪烧岩”方法,除去巨岩大滩,使水道、岸道畅通。

这条沿岷江上下的官道,首由李冰开通,因通到犍国的腹心之地,故史称犍道,这与前面提及的县级政区的“犍道”是有区别的,它是以族名为道路名,又称李冰通犍之道。这条道路,不仅对秦国经营蜀南地方有重大的政治军事意义,而且对犍侯国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更有重大的积

极作用。

李冰治夔取得巨大成果,千百年来宜宾的老百姓把他奉为神灵,尊为川主,立庙祭祀。

二、夔道筑城

秦二世三年(前207年),刘邦率领的军队首先攻入关中。秦亡后,刘邦被项羽背约分封为辖有汉中、巴、蜀三郡地的汉王。

那时,刘邦虽说分封有三郡之地,但他还来不及占领秦时巴、蜀二郡地的全部,在蜀郡的统治大体止于成都平原南部。此时蜀南以今宜宾城三江口为中心的夔侯国,在秦吏和秦军撤走而汉王刘邦的军队又未至之时,趁机独立出去与夜郎国联合,常頌通五尺道地方秦置吏抚治的“诸此国”,也脱离了秦王朝。他们对新入主的汉王刘邦既不归附,甚至还起兵对抗。正如《华阳国志·蜀志》所言:“(汉王刘邦)虽王有巴蜀,而南中不宾也。”

公元前206年,刘邦在楚汉战争中彻底打败项羽,建立西汉。

西汉初兴,经济残破,国家无财力可言。中央政府与各诸侯王的矛盾十分尖锐,无力顾及巴蜀西南边陲地区,主动放弃了对秦时通道置吏的广大滇东北、黔西北地区的统治,下令“关蜀故徼”。

西汉政府“关蜀故徼”后,五尺道废弃,但“夔道”仍为西汉政府控制。至汉高后年间(前187—前180年),经过20余年的与民休息,发展生产,汉帝国的国力有所增强。

夔侯国地方自李冰治夔设置夔道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断移民,“汉民多”,已完全具备了成为“内郡之县”的条件。此时的西汉政府对于夔侯国归附夜郎和“南中不宾”的政治现实,再不能听之任之。出于要“臣服南中”,

巩固和加强对蜀南边陲地区的统治的政治需要,在西汉早期把“犍道”升建为犍道县,设县令直接治理,并于高后六年(前182年)在今宜宾三江口修筑了犍道城。

犍道县初建,其辖境就是犍侯国的地盘,约为今宜宾市的辖地范围。

犍道县和犍道城的建立,是宜宾古代历史的重大转折。它标志着西汉政府对犍国地方的直接统治,郡县制完全确立。犍侯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不复存在,秦在犍国地方试行的“侯国”与“道制”并存的统治从此结束。

犍道城之所以建立在今宜宾三江口,是因为这里地扼通滇要冲,势当川南门户。这里双江(金沙江、岷江)环抱,大江(长江)始流;群山(翠屏、真武、官斗、登高、七星等山)拱卫,平坝(旧州、天池、南岸等坝)纷呈,可谓枕山濒江,雄据地势。在这里筑城,完全符合古代建城“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低勿近水而沟防省”的条件要求。犍道城初建时规模不大,仅三江口西南一隅,面积约0.5平方公里。

犍道城的修建,是西汉政府“臣服南中”、巩固和开发西南边疆的政治、军事需要。所以一建立,即成为西汉前期蜀南的政治中心和军事重镇,西汉中期成为汉武帝开发“西南夷”的战略基地和用兵“西南夷”的桥头堡,此后各代王朝都把它作为川南政治中心和军事重镇加以经营。自汉至清代,这里都是郡(州、府)、县的治所,唐代还设了戎州都督府,元代设了叙南等处蛮夷宣抚司,明代设了叙南卫。民国时为四川省第六行政专员公署驻地,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为四川省宜宾专署、宜宾地区行署、宜宾市人民政府(地级)驻地。

三、犍为郡与犍道县同城共治

汉武帝时,西汉经过“文景之治”,已发展为极盛时期。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掀起开拓西南边疆的高潮,一定要把广大的西南夷地区纳入版



樊道城最初位于三江口城区西南一隅,即今走马街、栈房街一带。图为1993年的走马街(张光金摄)

图,实现郡县一统大业。

建元六年(前135年),也就是汉武帝继位的第六个年头,他接受了出使南越回到长安的唐蒙的建议:借夜郎国精兵,从牂牁江水道直下番禺(今广州)消灭南越国,并在夜郎地区(今贵州)设官吏置郡县。他拜唐蒙为中郎将,率士兵千人,水陆转运粮饷者上万人,从巴郡符县(今合江县)符关出奇兵,直入夜郎

国拜见夜郎侯多同。

唐蒙一方面向多同厚赐财礼，一方面晓谕大汉威德，多同得到丰厚的财礼后，同意“置吏”。此时夜郎国周边小邑看到多同突然得到许多财礼，又寻思汉王朝离自己道路险远，终不能占有自己的地盘，在得到重礼后都愿意置吏。于是汉武帝在同年分蜀郡南部、巴郡西部加上新归顺的夜郎国及“旁小邑”地，设置了犍为郡。

犍为郡初置，其治所设在犍（今遵义市西），所辖地域甚广，即有今四川南部、贵州西北部和云南东北部。

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犍为郡治所移设南广县，至汉昭帝始元初年（前86年）郡治所再移至犍道城。时犍为郡辖12县，其中南广、存𡗗馬𡗗（今宣威县）、堂狼（今东川市）三县在今云南东北；汉阳（今贵州威宁、赫章、水城县一带）在今贵州西北部；另七县在今四川南部：犍道县（今宜宾市）、江阳县（今泸州市）、武阳县（今彭山县）、南安县（今乐山市）、资中县（今资阳市）、符县（今合江县）、牛鞞县（今简阳市）。

犍为郡其时有人口十万九千四百一十九户，若按每户以六口之家计，则有人口约七十万人。而犍道县是秦蜀守李冰时就设的县级政区犍道，西汉高后年间正式建置为县，其户决不会下于万户，人口不会少于6万人。

犍道城是犍为郡所辖四川南部及滇东北、黔西北的政治中心和汉中央政府开发“西南夷”的转输地和桥头堡。犍为郡从设至废，治所多变。从西汉昭帝始元初（前86年）到东汉建武十二年（36年），犍道城首次成为犍为郡的治所历94年，后徙治于武阳（今四川彭山）。公元四世纪末，南朝齐时，犍为郡治地由武阳迁还犍道城，犍道城第二次成为犍为郡治。隋大业三年（607年），改南朝梁武帝大同十年（544年）在犍道城设立的戎州名犍为郡，犍道城第三次成为犍为郡治所。

犍为郡与犍道县同城共治于三江口犍道城。